

儒 学 与 中国少数民族思想文化

肖万源 主编



当代中国出版社

98820

K28-53
2

儒学与 中国少数民族思想文化

肖万源主编

当代中国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儒学与中国少数民族思想文化/肖万源主编.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7. 3

ISBN 7-80092-562-5

I. 儒… II. 肖… III. 儒家-哲学思想-影响-少数民族
-研究-中国 IV.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22646 号

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发行

社址: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三河市艺苑印刷厂一分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 10.5 印张 2 插页 253 千字

1996 年 12 月 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 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定价: 18.00 元

前 言

本书，是继《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宗教·儒学》（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出版）后，由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编辑的第二本专集；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和文化的研究，今后还将陆续编辑中国少数民族思想文化与道家道教文化、中国少数民族思想文化与佛教文化、中国少数民族思想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等专集。

儒学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撰写中国通史，中国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哲学史、伦理道德思想史、文学艺术史、教育史等，不写相应的少数民族的东西是不完整、不全面的，甚至不能称作“中国的”通史、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哲学史、伦理道德思想史、文学艺术史、教育史等。本书，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问题。

本书，是中国有史以来关于儒学与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研究的第一本专集。其主旨是：阐述儒学与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双向性”关系，即二者既是互相影响，相互补充的，又是共同发展、彼此融合的，它们一起构成了绚丽多姿的中国古代文化。所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56个民族即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

儒学与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关系的双向性，就儒学对少数民族古代文化的影响上说，众多少数民族先民尊孔崇儒读经，受到儒学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哲学思想、教育思想、文

艺思想等不同程度之影响，有的接受使之与本民族传统文化并行不悖；有的根据本民族之需要予以改造，揉进本民族传统文化之中；有的与本民族文化结合，以之为从属；有的在保有本民族传统文化某些基本特质的同时，继承、发挥儒学的基本思想，以为主体。可以说，儒学思想通过不同途径、以不同方式、程度不同地融入到众多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而其“三纲”、“五常”思想则大都为中国少数民族先民所接受和应用。就少数民族对儒学的影响来说，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儒学吸收、改造了少数民族古代文化中某些观点或思想，丰富了自己的思想内容；二是少数民族对儒学思想的流传不绝、演变发展、影响不断扩大，乃至自汉至清处于官学地位，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对于儒学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系之双向性，本书中均有不同程度的论述或涉及。其中，关于儒学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影响及其原因，儒学与少数民族的哲学思想、伦理道德、礼仪习俗等的关系，少数民族及其文化对儒学思想发展的作用，以及儒家义利观与民族地区市场经济等，则是本书的主要内容。

儒学与中国少数民族思想文化的关系这一问题，是前几年提出来的。由于资料准备不足，关于少数民族及其文化对儒学的影响，只有议论，而未见专文、专著面世。1994年11月下旬，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等组织、单位在云南省景洪市召开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和哲学全国学术讨论会”上，有的与会者提供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与儒学”方面的论文，在讨论中又明确地提出并简单研讨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儒学的“双向性”问题。这一问题在会后编辑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宗教·儒学》专集中也有所反映。1995年9月下旬，由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办，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和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社会科学联合会协办，于吉首市召开的“儒

学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学术研讨会”，列有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儒学的积极影响方面的参考题，有的与会者撰写了专文。实事求是地说，相对而言，探研少数民族及其文化对儒学的影响，要比阐述儒学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难度更大。这除了需有资料的准备外，人们的认识也是有个过程的。本书中收入的几篇文章对这一问题作了点研究，仅是抛砖引玉，刚开了个头，而进一步的成果，尚待有兴趣者作进一步地探研。

儒学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系之研究，应从其“双向”性上全面进行。这一研究，不只是学术问题，具有学术价值、理论意义，还是一个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问题，颇具现实意义。“中国传统文化”是古代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文化的总称，亦即是以汉族为主体的56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的总称。因此，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当然包括弘扬55个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内。所以，研究少数民族古代文化及其与儒学的关系，是必要的、不可回避的、有意义的。本书的作者对此做了一点工作，但由于研究的时间短，水平所限，有的文章的观点可能欠妥甚而讹误之处在所难免，请读者不吝指教，以推进这一研究的开展。

《儒学与中国少数民族思想文化》一书的出版，得到当代中国出版社领导及第二编辑室主任默明哲先生大力支持，在此谨致谢意。

肖万源

一九九六年八月十五日

目 录

前 言	(1)
儒学在云南少数民族中的传播和影响	伍雄武 (1)
儒学在云南传播的高潮及其启示	雷 希 (15)
儒学在贵州多民族地区古代社会的传播与影响	唐建荣 (27)
儒学对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	韦启光 (40)
儒学在壮族地区传播与壮、汉民族融合的 历史考析	韦致灵 (51)
浅析儒学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的原因	王永祥 (71)
试论谪边儒臣在促进多民族文化融合中的历史地位 ——以韩愈、柳宗元、苏轼、王阳明为例	周继旨 (78)
试论彝族哲学思想对儒学的继承与发挥	田光辉 (83)
儒家思想与蒙古族哲学	武国骥 (97)
“天人合一”思想与蒙古族草原文化	格·孟和 (105)
儒学与少数民族伦理道德	杨国才 (118)
儒学对满族伦理道德的影响	何溥溢 (137)
朝鲜族伦理道德文化与儒学	金京振 (154)
儒、侗传统伦理文化的比较	张世珊 (168)
《侗垒》中的儒家政治伦理思想影响	王兴国 (185)
《清真指南》与儒家伦理道德思想	龚友德 (195)
从《滇黔土司婚礼记》看儒学礼仪对少数民族 婚俗的影响	刘宗碧 (212)

DM74/03

儒学与湘西苗族礼俗	丁畅松 (225)
儒学思想对近代蒙古文学的影响	扎拉嘎 (237)
壮族的爱国主义传统与儒家思想	何成轩 (252)
“儒学与兄弟民族文化”简论	吴 为 (272)
试论楚蛮夷神话和巫术对汉代儒学的影响	马振铎 (284)
中国少数民族在儒学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肖万源 (294)
儒家的义利观与民族地区的市场经济	张克武 (316)

儒学在云南少数民族中的传播和影响

伍 雄 武

云南地区虽然远离中原，古代又为烟瘴疫疠之地，但是，从远古就和内地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据说，殷商时期冶炼青铜所用之锡，有的就来自云南。而据《史记·西南夷列传》等文献记载，战国时期楚人庄蹻就曾率众入滇，到达滇池地区。他们一方面把内地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带入云南少数民族之中，另一方面又“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即接受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和文化传统，并成为其中的一员。庄蹻入滇带到少数民族的内地文化是些什么，未见文献记载，今人难于知晓。内地文化传入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而见诸文献者，自东汉始，而儒学则是其重要内容。故本文所述儒学在云南少数民族中的传播和影响，就从东汉开始。

—

从东汉自魏晋，以滇池、洱海为中心的云南地区被称为“南中”。南中的主要居民史称夷人、僰人、叟人，他们是彝、白、纳西、傈僳等兄弟民族的先民。这一时期，内地汉族已大量迁入南中，其豪门大姓和夷人、叟人的首领、贵族相互联姻，成为当地的统治势力，史称“南中大姓”。故而，“南中大姓”是“夷化”了

的汉人，同时也是“汉化”了的“夷人”（少数民族先民），他们体现着内地文化和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这些大姓，如孟氏、高氏、雍氏，他们一方面是少数民族，保持着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在当时的夷人、叟人中有巨大的影响，同时又具有较高的内地文化，由此，他们逐渐成为南中地区的统治势力。这段时期南中大姓所接受的内地文化，从思想内涵来说，主要是儒学思想。这从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云南昭通县出土的《孟孝琚碑》可得到确证。《孟孝琚碑》，立于东汉末年，为孟孝琚的墓碑。孟氏即为南中大姓，故此碑可代表其时南中大姓的思想。在碑文中，尊孔子为“大圣”，赞美颜渊、子路；夸奖孟孝琚“十二随官受韩诗，兼通孝经二卷”；对他早逝叹惜道：“痛哉仁人，积德若兹。”这些全是儒家的思想、概念。

两晋时期，南中大姓相互争斗、并吞，到东晋成帝咸康五年（公元339年），孟、雍、霍等姓在火并中同归于尽，惟有爨氏独存，遂称霸南中。由于长期战乱，生产破坏，民生困苦，各族人民希望安定。爨氏顺应民意，统一南中，终止战乱，故而其政权稳定，势力不断发展，到唐初，已成为占地广阔、延续三百余年的地方政权。爨氏为夷汉之混合，其治下亦为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先民（特别是彝族、白族的先民），故其思想是为南中统治阶层之思想，亦可部分地代表少数民族上层之思想。对于爨氏的思想，现能直接见诸文字者就是《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了。

《爨宝子碑》是为爨宝子的墓碑，出土于云南曲靖县。爨宝子者，为滇东地区统治阶层人物，曾受东晋封敕为建宁郡太守。此碑为其属下于晋义熙元年（公元405年）所立，其中赞颂爨宝子说：“君少禀瑰伟之质，长挺高邈之操。通旷清属，发自天然；冰洁简净，道兼行苇，淳粹之德，戎晋归仁。”这些，大约都是奉承之辞，爨宝子一生是否如此不得而知，但是，其行文中用于品评

人物的基本概念：质、操、道、行、德、仁等，是为魏晋玄学品评人物常用的概念，这就说明，碑文作者及爨氏对于融合儒、道的玄学，已有所接触和接受。

《爨龙颜碑》则是爨龙颜的墓碑，立于南北朝刘宋大明二年（公元458年），出土于相邻曲靖的陆良县。龙颜曾为晋宁、建宁二郡太守。碑文赞颂其为人：“容貌玮于时伦，贞操超于门友，温良冲挹”；其为政：“仁笃显于朝野，清名扇于遐迩，……民歌其德，士咏其风。”这仍然是魏晋玄学的思想和概念。

从两爨碑可知，魏晋时儒学已传入南中地区，并为统治集团所接受和认可。在我看来，爨氏政权得以兴起并统一南中三百余年，这和他们突破巫教的鬼神迷信、接受较先进的儒家政治伦理观念有着直接的关系。爨氏统治南中的三百余年正值南北朝时期，这时中央政权更迭频繁并且力量衰弱，对南中的控制经常力不从心、时有时无，但是爨氏政权却始终承认中央政权的宗主地位，没有趁乱而脱离中原、裂地自立，究其思想根源，或许与其接受儒学政治伦理思想从而对中原文化形成认同有一定的关系吧。

二

继爨氏政权之后统治南中地区的是“南诏”政权。唐初，在洱海地区出现了六个民族集团，史称“六诏”。六诏的主体是彝族和白族的先民，同时也包括纳西、傈僳、拉祜等兄弟民族的先民。8世纪时（唐开元年间），六诏中的南诏（蒙舍诏）在唐朝的支持下，统一六诏，建立了包括今云南大部及川、黔、桂部分地区的强大政权。南诏的统治集团是彝族和白族的先民，其治下的人民包括现今云南各民族的先民。南诏存在二百余年，是云南少数民族建立的又一持久、强大的地方政权。

南诏建立之始就与唐朝中央政权保持密切的关系，对于中原儒、道、佛思想都兼收并蓄，但在政治伦理方面则主要吸取儒家思想。南诏曾先后派遣数千人到成都学习《诗》、《书》，对于战争中俘虏的儒生给予优待，让他们在统治集团中教授儒学，甚至担任清平官（相当于中原的宰相），参与政事。在当时南中地区巫教鬼神迷信盛行的情况下，南诏统治集团能积极学习儒学思想，这对于他们新兴政权的稳定和发展，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同时对于他们和中原的认同感与内聚力的形成，亦有重要的作用。这一切，最确实的证据和鲜明的体现，就是《南诏德化碑》。

《南诏德化碑》立于南诏赞普钟（阁罗凤）十年，即唐代宗大历元年（公元766年）。它由南诏数十名官员所共立，得到国王阁罗凤的赞许、认可，因此代表着南诏统治集团的思想，或者说代表着当时彝族、白族上层统治集团的思想。该碑正文共三千六百余字，主要说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说明“天宝之战”的缘由和南诏的态度，二是对阁罗凤的歌功颂德。天宝之战是南诏和唐朝之间的战争，前后四年。战争由唐朝挑起，而最后以唐朝二十万大军全军覆没、南诏大获全胜告终。《德化碑》正是于胜利之时立下的，但是，碑文中却竭力表示，这一场战争是由于“奸佞乱常，折磨生变”，诬告南诏所致；南诏不得已而应战，虽获全胜，但今后仍愿与唐和好，并“世世事唐”。南诏对战争的这种态度，有其政治、经济的根源，而在思想上则是以儒学的忠、孝观念为根据的。故在碑文中从儒学的根本观念出发来进行全文的阐述。如碑文第一段就说：

恭闻清浊初分，运阴阳而生万物，川岳既列，树元首而定八方。故知：悬象著明，莫大于日月；崇高辨位，莫大于君臣。道治则中外宁，政乖必风雅变。

这是认为，社会和自然都由清浊、阴阳二气所决定，是统一的，因

而自然界最高的秩序是日月的差异，社会的最高秩序就是君臣的尊卑。由此，一方面强调社会秩序有其客观必然的基础，要求依据“道”来治国，这就突破了边疆地区巫教的鬼神观念，为南诏统治集团提供了较为合理的历史观和社会政治思想，从而对南诏初期的兴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则强调君臣关系是社会最高的原则和秩序，故说：“夫至忠不能无主，至孝不可无家。”由此，而宣称，天宝之战虽获全胜，但是仍要与唐保持君臣关系、世世事唐。后来，果然于唐贞元十年（公元794年）与唐使会盟于大理点苍山下，重归于唐。在南诏与中原的这种关系中，儒学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三

唐天复二年（公元902年）南诏灭，后晋天福二年（公元937年）白族首领段思平建立大理国。大理国是白族为首、白族和彝族共同建立的多民族地方割据政权。其所辖区域和南诏基本一致，前后存在三百余年，至南宋宝庆元年（公元1255年）方为忽必烈所灭。

大理国的白族、彝族统治者，一方面从吐蕃及内地引入佛教，大力提倡佛教，同时又注意对儒学的学习和传播。这种儒、释并重的形势产生了大理国特有的知识分子——“释儒”（或称“儒释”）。“释儒”即是佛僧，对佛学校有修养，同时又读儒书，入科举，出任官职，娶妻成家，育儿养女。他们从释、儒两方面学习内地的文化，同时也从这两方面对大理国的文化和政治产生影响。

大理国“释儒”阐述其思想的著作不多，至今仅见者如刻于大理国元亨二年，即宋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的《兴宝寺德化铭》和《嵇肃灵峰明帝记》两块碑文。作者署名为“释儒才

照”或“试郎杨才照”。杨才照在《德化铭》起始一段就说：

盖闻率性之谓道，妙物之谓神。混成天地之先，独化陶均之上。体至虚之宅，无罅无门；运不偶之方，何固何执。未尝不出入五物，谁测至变之端；同流六虚，旁行大衍之数，知太始者，由之揆务。作成物者，宗之致能。形象分而变化斯章，动静常而刚柔乃断。玄凝易简之理，昭名久大之功。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

这是据《周易》而阐发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中揉合了儒道两家，而近于魏晋玄学。它表现了杨才照作为“释儒”对儒道两家哲学思想的深入理解。碑文在赞颂大理国上公高渝城光辅持大理国国君的事绩时说：“大义不可无方，至忠不可无主。……君臣之义最高，叔侄之分尤重。不异霍光辅汉，姬旦匡周，盛衰惟终，安危同力。”这完全是儒学之言，由之可以看到大理国“释儒”的释儒并重的文化特征。

四

元灭大理国之后，云南建行省，地方割据政权从此不复存在；现今云南各少数民族及其地域分布大体形成，而民族之间以及同一民族内部的发展不平衡却进一步加剧。

由于行省的建立，云南与内地的联系和文化交流进一步发展，儒学在云南的传播总的来说也就较前大进一步了。元世祖忽必烈多次下诏“命云南诸路皆建学校”。特别是世祖所任命的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著名的回族先民、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他治滇有方，在云南各地建立学校，大兴儒学教育，对儒学在云南地区的传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时人评议道：“赛典赤分省此方，创学宫，举师儒，北人鳞集，囊焚循理”，“设立学校，以弘既富而教

之义，如焚爨之类，巍巍然有知经者矣”^①。自此以后，随着教育的发展和科举制的推行，儒学在云南传播日盛。

但是，大理国之后，云南各民族发展的不平衡性，又使儒学的传播在各民族中情况各异。其中，儒学最为发达、水平最高的当推白族和回族。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以白族和回族先民为代表来说明这一时期儒学在云南少数民族中的传播情况。

元明以来，在云南各族中，白族继续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处于先进地位，其聚居的大理地区，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元代，在这一地区兴建学校，推行儒学教育。从明代开始，在白族地区开科取士，白族知识分子学习儒学，确切地说，学习宋明理学更为广泛和深入。许多白族文人通过科举入仕，到内地做官、讲学，对儒学更有直接而深入的理解和研究。其著名者，明代如杨南金、杨士云、李元阳等，清初如高翥映、王崧等。囿于本文篇幅，以下仅以李元阳、高翥映为代表对白族文人研究、传播儒学的情况略作说明。

李元阳（明弘治十年至明万历八年，即公元1497—1580年），字仁甫，号中溪，大理白族人，嘉靖五年进士，曾任监察御史等职。当其入仕为官时，明朝已处于衰败之中，宦官、佞臣专权，贪官污吏遍及上下。这种情况下，李元阳虽由边疆入内地为官，却能以儒学律己，公正清廉，以至得罪当权者，被贬出京。从此，他回到白族故乡大理，隐居四十余年不复出仕。

李元阳为监察御史时，曾据儒学原则上书明世宗说：“……王者，必修人事以称天所以命元之意，不举归之天以息人事也。陛下之始即位，以爵禄得君子，近年以来以爵禄畜小人。”^②在当时

① 云南诸路肃政廉访使王彦：《中庆路重修泮宫记》。

② 《李中溪全集·行状》。

情况下，他敢于如此批评皇帝，说明他既忠实于儒学原则，同时又极有胆识。他据自己在边疆民族地区生活的实际体会，对儒学“重民”和“德治”的思想作出自己独到的理解和认识。他在《云南通志序》中说：“治道莫先于域民。”^①又说：“夫黎元者国之元气也。”^②但他又认为，边疆少数民族也是黎元、人民，同样应当重视和爱护，他向当权者和时人大声呼吁：“万里边氓，亦国家之赤子。”^③汉唐以来，帝王将相大都从其狭隘观念出发，把云南边疆人民视为蛮夷、野人，动辄加之以武力，征讨杀戮。对此，中原儒生们多以为当然。而李元阳以边民自居，据切身体会而挺身抗议。他说：“阳，云南山泽一老民也，何敢出位僭言！但桑梓坟墓在焉，是为切己之痛不得不呼天呼父母也。”^④他指出：对云南边疆，“……喜功好名者往往任为他事，兴无名之师，杀无辜之民，费帑藏之金，破边氓之产”，如此，“为一己之功名，而视民若草菅”，实为罪过。他高呼：“世间愿无喜功人，永令百姓安其生。”^⑤这些思想，是他作为边疆少数民族思想家对儒学重民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李元阳中年以后潜心于养生之道，企求个人之解脱，为此，他从陆王心学出发而入于禅学。但是，李元阳又始终胸怀对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国家的诚挚关心，而不能弃绝尽忠、尽孝、济民的儒学政治、伦理思想和情怀。在这样一种生活态度的基础上，李元阳在理论上就力图兼有儒释两家。在他看来，儒学之中本有禅学的旨意、方法，如孔子所谓：“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他就认为与禅学一致。^⑥反之，他又认为，佛学亦可用于治国安民。他说：“宋韩魏公、范文正公、富郑公、司马温公立朝有此力量，皆

① 《李中溪全集》卷六。

②⑤ 《李中溪全集》卷七。

③④⑥ 《李中溪全集》卷十。

从佛学中来。”总之，在他看来：“老释方外儒，孔孟区中禅”^①，“禅非圣事，而非禅无以作圣耳”^②，为学须将释儒结合起来。他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有其明代中期的社会历史根源，也有其思想渊源。其思想渊源一方面是内地陆王心学和李贽诸人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对大理国以来白族“释儒”传统的继承。李元阳思想，对后来明清时期白族文人产生重大影响。

高翥映（清顺治四年至清康熙四十六年，即公元1647—1707年），字雪君，明末清初人，曾袭任云南姚安府土同知世职。其家族，数百年中累世为大理国重臣，元明两代世袭土司，又代有学人，因而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颇有影响。由于高氏家族和彝、白、汉、纳西各民族都有亲缘关系，故今日对其族属各说不一，但其为少数民族则为多数人的意见。高翥映作为少数民族土司却对儒学和佛学深有研究，著作数十种，并多年在故乡讲学授徒，培养了不少学生，因此对边疆民族地区文化发展颇有贡献。

高翥映对宋明理学有深入的研究，著有《太极明辨》等著作。他认为，万物的本源是理和气，但理更根本，而最高的理则是太极，故说：“道体莫全于太极”，“太极包得先后天理、气之全体”^③。进而认为，各种具体的理都是由太极分化、落实而来的，即：“太极至清，而一落阴阳、五行则有清浊；太极至善，而一落阴阳、五行则有善有恶。”^④他不同意朱熹“无极而太极”之说，反对在太极之前又加一无极。认为朱熹之说是“叫人从空处作旷旷荡荡、浩浩落落之想”。这些，说明高翥映对于宋明理学诸家，既深入学习、钻研，而又有自己的见解。

在上述世界观的基础上，高翥映对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有许

① 《李中溪全集》卷二。

② 《李中溪全集》卷十。

③④ 高翥映：《太极明辨》。